

碎金

碎金文丛



困学纪程

曹道衡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碎金文丛

困学纪程

曹道衡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困学纪程/曹道衡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碎金文丛)

ISBN 978-7-100-07207-6

I. ①困… II. ①曹…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515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碎金文丛

困学纪程

曹道衡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207-6

2014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1/2 插页 2

定价: 29.00 元

出版说明

学问一事，见微而知著，虽片言鳞爪，却浑然一体。及今观之，札记、书信、日记等传统书写方式，更是散发出无定向、碎片化的后现代气息。钱锺书先生便将自己的读书笔记题为“碎金”，凸显其特殊的价值。

文丛取名“碎金”，意在辑零碎而显真知，并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相映衬。丛书所录，非为诸名家正襟危坐写就的学术著作，而是其随性挥洒或点滴积累的小品文章。分为治学随笔、学林散记、日记书信与口述自传等系列，多为后人精心整理或坊间经年未见的佳作。希望这些短小而精美、灵性而深邃、言简而隽永的吉光片羽，能帮助读者领略名家学者的点滴妙悟、雅趣文字，一窥学术经典背后的丰富人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来京以前	6
(一) 家庭和童年	6
(二) 初进中学	14
(三) 重返私塾	19
(四) 学医无成	26
(五) 在无锡国专	29
(六) 报考北大的前一年	45
第二章 在北大上学	54
(一) 初到北京	54
(二) 在北大学习	58
(三) 初任课代表	70
(四) 下乡“土改”	74
(五) 补课和等候分配	97
第三章 在中央文学研究所	102

(一) 第一天报到	102
(二) 在大同煤矿	109
(三) 再次分配工作	112
第四章 不平静的书斋生活	117
(一) 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	117
(二) 《红楼梦》研究批判	119
(三) 不断的运动	124
(四) 运动的间歇	127
(五) 从 1957 年到 1958 年	131
(六) 进城以后	135
(七)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138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	143
(一)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43
(二) “五七干校”的生活	145
(三) 运动的继续	152
(四) 在文化部“录音组”	156

(五) 回到文学所	166
第六章 走上正轨	171
(一) 领导班子的建立和几项工作	171
(二) 南京之行	176
(三) 访问日本	177
(四) 右目失明和眼科手术	179
(五) 繁忙的 1984 年	182
第七章 曲折的道路	190
(一) 突如其来的改选	190
(二) 走自己的路	194
(三) 继续探索	197
(四) 我的退休	201
(五) 初次培养博士生	203
第八章 九十年代	207
(一) “文选学”研究会	207
(二) 招收第二届博士生	215

(三) 几项业务工作	223
第九章 我的退休生活	232
(一) 退休之初	232
(二) 移居西直门	237
(三) 手术室外	240
(四) 赴台讲学的设想	245
(五) 退休后的乐趣	248
后记	253

自序

当我开始执笔来写这本小书的时候，思想里存在着许多顾虑。首先一个问题是我自问平生碌碌，一事无成，把这些琐事笔之于书来告诉大家，未免“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之讥，而且还会浪费读者的时间。其次，长期以来，我一直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虽然写过一些文章，但都属考证或论说之文，至于那些生动活泼的文章，不但从未试过，而且自觉也无此才能。因此动起笔来，确有点像陆机说的那样“兀若枯木，豁若涸流”之感。所以有时甚至想就此搁笔了。但我终于坚持写了下去，总算把它写完了。因为我觉得自己虽乏善可陈，却也见到过许多大学者，亲自受

到他们的关怀和指导。自问这几十年来，正是在这些师长的循循善诱之下，才避免了不少弯路，多少取得了一些进步。至于我自己至今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没有取得什么成绩，那一方面是由于我个人的努力不够和天分有限，另一方面也多少有着历史的原因。回顾当年师长们对我的教诲，不光使我终生受用不尽，而且对现在有志于学术研究的人，同样也会是大有帮助的。现在这些前辈师长多数已经谢世，后来的研究者已经不可能再受到他们的亲炙，因此我更有责任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比我年轻的人。因为这些师长的教诲，本是治学的宝贵经验，也是学术界共同的遗产。把这些宝贵的经验传达给下一代，这应该是我无可推辞的责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不顾自己的简陋，记述了这些嘉言懿行。我想这些师长对我的教诲，对别人也是很有益的。除了这些内容之外，在这本小书中，自然也免不了要谈到我个人的一些经历。这里有些可能是一得之见，虽未必有多大意义，也可供比我年轻的同志参考，更多的应该说是教训，这些教训，也许可以供别人作为前车之鉴。当然，对这些经验和教训，也只是根据我个人的想法来评价的，是否值得

参考和借鉴，还希望广大读者自己去作出判断。

在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关于前几年流行于学术界的所谓“新方法”问题。尽管有些提倡“新方法”的人认为我是这种“新方法”的反对者，但我至今不承认这种看法。从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每次重大的进步，都必然有着“方法”的更新。宋人之于汉唐是这样，清人之于宋明是这样，“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是这样。因此我没有任何理由也不可能反对别人去研究和介绍当代西方的某些新观点、新方法。问题在于当有些人在接受某种新观点、新方法时，不是认真地加以翻译、介绍和阐释这些学说，让别人理解它、接受它，而是板着面孔责备别人“保守”，不知道接受这种新说。其实他们不想一想，像我们这一代人的外文水平，是否能读懂这些书的原文就很成问题（其实有些热心提倡“新方法”的人，其外文水平也未必比别人强）。何况即使能读懂，也未必找得到这些原著。再说纵使我们见到了这些“新方法”的著作，也要有个较长的熟悉和理解的过程，才谈得上接受和运用。看来这些人对推广“新方法”实在过于热衷了，竟要一些不知道、不理解这些“新方法”的人一下子

变成这些“新方法”的信徒。如果做不到，他们就会棍棒交下，甚至追究别人的“心态”，用勒令“停业整顿”相威胁。这样，被批评者自然很难心服。再说有些“新方法”的宣传者为了证实自己的新说，有时引证史料又不甚严谨，甚至对史料的理解也有错误。因此迄今为止，我还不承认自己是“新方法”的反对者，我所反对的仅仅是某些借着“新方法”的口号来整人的人。

本来，学术上有不同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学术本身也不可能有所发展。当不同意见出现的时候，只能通过平心静气的讨论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不妨各行其是，让历史去作结论。如果因为别人一时接受不了某一新说就视之犹同“张作霖”、“吴佩孚”这些军阀，请问这和中世纪欧洲的“异端裁判所”又相去几何呢？学术上有些问题本来是很复杂的，即使多数人有了共识，少数人也仍可坚持其不同意见，何况有些新说，还远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呢。这个问题在我思想中存在很久，至今未得解决，所以在书中也许谈得多了些。

最后，我还要说明的一点即是此书文笔颇乏生

动，这是我久已认识而始终不能克服的毛病，在这里只能向读者致歉了！

最后，我这本小书之所以能写成和出版，首先应该感谢韩雪博士的鼓励和推荐，更应该感谢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不弃。如果不是他们的大力支持，我是没有信心和勇气去写这样一本自述性的小书的。

曹道衡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时年七十有二

第一章 来京以前

（一）家庭和童年

我出生在一个中医家庭，据说我家从事医术已有七八代历史，可是到我手里，却失传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可以称为曹家的“不肖子孙”。

曹家虽说是苏州人，但祖上原出安徽歙县，移居苏州已经很久，以致我现在已说不清这个家族迁居苏州的时间了。听老人们说，曹家的祖先刚到苏州是从事商业的，后来亏了本，就改习医术。那时的境况也并不算好，直到我的曾祖父手里，才成了当时的名医，发起家来。我曾祖名叫曹元恒，医号沧洲。因为他的医术在清末的江浙一带很有名声，所以有一次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有病，就叫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到苏州召

他入京为皇帝治病。关于我曾祖父为光绪治病的事，近年来常有人提到，但我对此事却所知甚少。我只是早年曾听到老人们提起，说给皇帝治病要冒很大的风险，因此我曾祖父开的处方都是些平安药，并没有使出他的真本领来。但通过切脉，他已经多少预见到光绪帝的病难于治愈，在一度减轻之后，就很快南归。后来光绪的病再次发作，又曾征召过他，但他装病推辞，没有进京。那次为皇帝治病，大约对我家的社会地位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在清末，我家也算苏州的名门。

我的祖父叫曹岳昭，字融甫，他是我曾祖的幼子，他在苏州行医，有了一定声望以后，就移居上海。因为当时上海有着所谓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那时正值北洋军阀混战之际，江浙一带发生了齐燮元和卢永祥之战，很不太平，因此要在租界中找一个安身之地。我祖父到上海后，先是在租界里租一处房屋，开业行医，后来赚了钱，就在威海卫路一个里弄中买了一所房子，既作住宅，又作诊所。后来我祖父也就是在这所房子中去世的。那已经是抗战中期的事了。

我父亲叫曹凤来，字泰吉，也是中医，一直在上海行医。我的母亲姓潘，是清道光年间军机大臣潘世

恩的玄孙女。潘家是世族，文化教养很高，我对古典文学发生兴趣，主要是受了舅家的影响。近年来，有一些朋友常常说我继承了“家学”。他们大概是我受了曾叔祖曹元弼先生和从曾伯祖曹元忠先生的影响。其实，曹元忠先生一直住在北方，而我家一直在南方，我从没有见过他，只是幼时在家里见过他的文集叫《笺经室集》，那时年纪还小，看不大懂。曹元弼先生我倒见过几次，他住在苏州，直到解放后才去世。他最有名的著作是《礼经校释》，是一部研究《仪礼》的专著，在清末民初很有影响。他是清代的“遗老”，到晚年时已双目失明，所以从不出门。我年轻时到苏州，曾去拜见他，他已经八十高龄，自然也不会向我这样的小孩子讲什么学问。

我是1928年出生在上海的。据说出生的地方叫“茂德里”，在现在人民公园附近的新昌路。对此我已全无印象，因为大约在我两岁左右就搬到了威海卫路。这大约是1930年的事。搬到威海卫路时，我还什么也不懂，但到1932年初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我还多少有些印象。首先是那次我家忽然来了许多苏州亲戚，都是逃难来的，威海卫路的房子本来不小，这时

却住满了人；还有是从家里向北望去，可以看见闸北一带到处冒起黑烟。这就是日寇的飞机狂轰滥炸的结果。总的来说，那些印象都很零碎和模糊，因为那时我还很幼小。

我的曾祖父就是那次避难来上海时病逝的。去世后家里办丧事的情况，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见到大人们都穿起白布的衣服，还常有些和尚来敲敲打打，有时大人也领我去磕几个头，这些事，我自然丝毫不理解其意义。

我曾祖父去世后不久，由于淞沪抗战已经停止，苏州来的本家和亲戚都陆续回去，我家又回到了过去那种平静的状态。童年的生活是这样的平淡，那些年好像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记忆。直到1935年我虚岁七岁时，才开始上学。我记得第一位老师是一家大户人家的少奶奶，她和我一位伯祖母大约有些亲戚关系，并且也住在威海卫路那条里弄中。因为闲居无事，才来教我念书。我记得入学那天，家里还点起了香烛，由大人领着我跪拜，说是“拜孔圣人”。拜完圣人，又向老师磕头，说是“拜师”。这一套仪式完毕后，老师就领我进入书房。刚入学的时候，无非是先认识一些